

比较研究丛书



比较史学

范达人 易孟醇 著

湖南出版社

比较史学

范达人 易孟醇 著

湖南出版社

比 较 史 学

范达人 易孟醇 著

责任编辑：曹有鹏

*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199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375

字数：269,000 印数：1—2,000

ISBN7—5438—0094—2

K·13 定价：5.90元

比

較

史

學

吳于廑

題

題



《比较研究丛书》出版说明

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旨在揭示商品生产的产生和发展的种种条件和过程，但同时大量地论述了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什么呢？恩格斯说：“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反杜林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和实践中，我们可以深刻领会到比较方法的重大意义。运用比较方法于各种事物之间，求同求异，求变求常，不但可以更清楚地认识事物的优劣，而且可以较易地由此而探索出事物的发展规律。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方易见真谛。

比较方法，作为一种论述的方法和研究的方法，源远流长。我国先秦诸子，如《韩非子》，便大量运用过这种方法；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对一百五十八个城邦的政治、法律制度进行过比较；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便是对东西诸国的法律进行比较的结晶。但是，广泛地运用比较方法于科学研究，并形成许多新的学科，则始于十九世纪的欧洲，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方大盛行。在我国，比较研究起

步稍迟，基本上是在确定改革开放后的十余年间才逐渐兴起，但是，已受到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并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高质量专论和专著。

为了及时反映我国学术界在比较研究方面的成果，我社特出版《比较研究丛书》，陆续问世。

这套丛书，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包括多学科、多层次、多方面的比较研究专著，既注重学术性，也注意深入浅出。我们希望学者们和读者们都来耕耘这块园地，让这块园地生长出更多的壮株硕果。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方法的意义..... (1)
- 第二节 历史比较的可行性..... (8)
- 第三节 历史比较的功能..... (15)
- 第四节 历史比较的局限性..... (42)

第二章 历史比较的条件与要求

- 第一节 可比性原则..... (49)
- 第二节 比较的标准..... (56)
- 第三节 比较的要求..... (63)

第三章 历史比较的种类

- 第一节 类型比较..... (74)
- 第二节 渊源比较..... (80)
- 第三节 影响比较..... (90)
- 第四节 类比..... (95)
- 第五节 比较方法的多样性..... (104)

第四章 历史比较的具体程序

- 第一节 建立参照系, 提出假设, 探寻因果..... (117)
——以《皇权主义异同论》为例

第二节	按问题边比较边议论·····	(139)
	——以《宗教色彩比较研究》为例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历史比较

第一节	为历史比较确立的最基本原则·····	(157)
第二节	运用历史比较为现实服务·····	(163)
第三节	运用历史比较阐发历史特征和规律·····	(169)

第六章 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历史比较

第一节	从比较中求“以史为鉴”·····	(176)
第二节	从说理比较、优劣比较到求真比较·····	(180)
第三节	中国传统历史比较的特色·····	(195)

第七章 当代中国的比较史学

第一节	比较史学在中国大陆史坛上的兴起·····	(199)
第二节	杜维运的比较史学观·····	(225)
第三节	许冠三与比较史学·····	(249)
第四节	港台比较史学二例·····	(258)

第八章 当代国际史坛上的比较史学

第一节	历史比较在西方的源流·····	(267)
第二节	欧洲的比较史学·····	(270)
第三节	美国的比较史学·····	(283)
第四节	历史比较研究在苏联·····	(313)
第五节	其他国家的历史比较研究·····	(347)

后 记	·····	(357)
-----	-------	-------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方法的意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科学研究的领域里，欲达到预期的效果，也必先讲究方法。方法也是器。比如渡海，可乘轮船，可坐飞机。轮船、飞机都是器，都是渡海的方法。不选择渡海的方法，或采用过时的、落后的方法，如木帆船或舢板之类，就难以达到大洋的彼岸；而先进的方法，常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有个古老的故事。“昔有谐谈，谓吕纯阳见一寒士，欲济之，指庭前一石成金，举以相赠。士不受。吕惊喜，以为此士不贪，可学道。士则曰：‘吾欲得汝点石成金之指耳。’”1936年8月，蔡元培为蔡尚思的《中国思想研究法》写序言，引述了这个故事，然后评论道：“可以见爱智之人，欲得其方法，远过于具体之知识也。唐人诗曰：‘鸳鸯诱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可为一切吝于说方法者之写照矣。”方法的意义，蔡元培可说是讲得至深至透了。

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任何一项科学研究，必须具备三个要素：一是研究的条件，包括研究对象、研究者的学与识、研究资料和设备等；二是研究的方法；三是研究的目的。三要素中，研究的方法是极重要的一环。它是一座桥梁，一座从研究的条件出发，到达研究的目的地的桥梁。所以，古今中外的学问家未有不

重视方法论的探讨的，未有不重视对方法的掌握与运用的。“一夜飞渡镜湖月”，“我欲乘风归去”，都只能是一种梦幻。运斤成风，“尽垩而鼻不伤”，这种入神的技艺，才是对方法的高超运用。

但是，并不是所有方法都是正确的、科学的。杀鸡用牛刀，与用水果刀杀牛，同样是不妥当的。研究科学的方法，必须是科学的，也就是说，必须是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方法，只是全部方法中的一个小类，但却是各类方法中最重要、最精粹、最有用的一个小类。大凡科学方法，必然具备下述特征：一是方法本身的明确性，即它不是含含糊糊的，也不是可以随意解释的，它必定可以被人们明白无误地、准确地掌握与运用，而且它的运用过程是可以检验的。二是方法对目的的选择性，即方法是为目的服务的，一定的方法只能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而不能为所有的目的服务。换句话说，一定的目的只有选择了一定的方法以后，才能实现。三是成果的必然性，即方法本身的可靠性，选择并正确运用了一定的方法，就必须达到一定的目的，产生一定的成果，有时还会产生意料以外的成果，反之，不能得到一定成果的方法，就得考虑方法的选择是否得当，运用是否得体，甚至应该考虑方法本身的价值。四是方法的经济性，即选择一种方法以实现研究的最佳效果时，必须同时在精力、时间、物力上的花费最少。当然，每一项科学方法并不一定同时具备上述四个特征，其中的某项特征有时可能不够显著，有待改进。因此，科学方法本身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在不断完善和充实之中。

科学方法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古代的《墨子》对逻辑的运用，就是最早的朴素的方法论。但是，较之今天人们对形式逻辑的运用，已不可同年而语，更不用提辩证逻辑了。古希腊的三大哲人中，苏格拉底（约前470～前399年）注重普遍的定义，注重归纳的论证；柏拉图（约

前428~前348年)的《智者篇》解释了否定命题的真正性质;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的《解释篇》和《前分析篇》探讨了各种形式的逻辑命题,《后分析篇》阐述科学方法:他们的成就为后代的方法论奠定了基础。至十七世纪,培根(1561~1626年)在晚年著《伟大的复兴》,其中《新工具》篇描述了一种新的逻辑方法,明确地指出工具是帮助人类获得新知识的手段。他提出,只有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才是科学的认识方法。1637年,笛卡儿(1596~1650年)著《方法论》,提出不要轻信事物,要运用逐步分析,由简到繁,彻底复查的方法,他强调使用数学上的、从明白无误的公理出发进行推理的方法。他的“我思故我在”,成为千古名言。1886年,牛顿(1816~1894年)完成了他的科学巨著《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不但提出了力学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而且在培根和笛卡儿设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科学方法的体系。这个体系为自后的科学家们所一直遵循。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卓有成效地把自然科学中的许多研究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他们在巨著《资本论》和其他一系列著作中,把研究方法牢固地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从而使人类认识史中的方法论发展到了一个光辉的台阶。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科学研究的日益发展,对方法的研究日益深入,方法也日益多样、日益科学。总之,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正如培根所说,发明的技巧是与发明本身同时产生的。反过来,当一种科学方法一旦产生,就必然为进一步的科学研究提供捷径,开辟胜利之路。

人类的历史,作为一项科学研究的对象,与其他研究对象有许多不同之处。主要是历史现象不能如自然现象一样可在实验室或其他条件下“复原”,时间和空间把认识的主体(史学家)和

认识的客体(历史现象)阻隔万水千山,迷雾重重;而且,史学家借以认识历史现象的中介(史料),除了文物和原始文献之外,绝大部分都包涵着撰写者和编纂者的个人因素,他们的立场、观点、认识水平和认识角度大不相同,使史料或者成为了“走了样的历史现象”,或者如顾颉刚在《古史辨》中所说,成了“层垒地构造的历史”。梁启超曾有一段自白:“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①亲历者常为感情所支配,传闻者或后之纂史者则不免有如雾里看花。因此,史学家的方法问题较其他学科的探索者尤为重要;否则迷途忘津,追悔难及。刘知已在《史通》中提出史家“三长”,其中史才便是指的纂史、治史的方法,史学则是指的史家拥有丰富的学识和资料,即上文所说的科学研究的条件。他论述二者的关系道:“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亩,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室无榱桷斧斤,终不能成其宫室矣。”^②他的论述很通俗,也很贴切。不妨再引述蔡尚思的一段话,进一步看看史学与史才,亦即博学与方法的关系。他说:“无方法的博学,任你道贯古今、学博中外,终是博而寡要,劳而无功,垃圾箱、字纸麓的博学,自己不得要领,便无以使后学者多所心得,所有整理或研究工作,多等于白费。”同时,“不博学的方法,任你说得天花乱坠,滔滔不绝,终是纸上谈兵,闭门造车,神话式、玄谈式的方法,没有多大适用,甚至所谓真者非真,由自欺欺人,而误己误人。”所以,蔡尚思说:“博学而不知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

② 刘昉:《旧唐书·刘子玄传》。

方法者，只是半个学问家；有了方法而不能博学，也还是半个学问家。”^① 这就是才学兼备为什么自古以来都被人们所赞誉、所追求的理由。

作为实现科学研究的目的的一切手段的总和的科学方法，是包括实验、试制以及运用计算机等先进技术在内的。但，人们常说的科学方法，主要指思维的方法。而思维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阶级分析法，心理分析法，逻辑学中的类比法、归纳法、演绎法，又例如发生学方法、模拟方法、公理化方法、形式化方法、系统论方法、概率论方法、统计方法、优选学方法，等等。如果运用多种方法于同一项科学研究，无疑，科学研究的道路会更加平坦，效果会更加显著。比较法，只是众多科学方法中的一种。所谓比较，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对照着看。它本身是人类最一般的思维方式。谁高、谁矮，谁美、谁丑，谁优、谁劣……等等，都是进行比较后的认识；即使几岁的小孩也善于运用这种比较思维方式。但是，当把这种比较思维方式有意识地运用到文化领域、科学研究领域时，当人们对比较的目的、比较的功能、比较的对象、比较的范围、比较的标准、比较的类型、比较的程序等等进行理性的思辨时，情况便与“小孩也能进行比较思维”有天渊之别了。换句话说，这个时候，比较法也就成为以方法为研究对象的方法学的一个分支了。

比较法最早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如比较解剖学，以后才逐渐引入到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形成了一系列独立的学科，如比较历史语言学、比较法学、比较教育学、比较宗教学、比较文学等。比较史学（Comparative History）是比较学中的一个门类。

^① 蔡尚思：《中国思想研究法》，第1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什么是比较史学？首先，比较史学是与历史的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y of History)有区别的。后者指一种方法，一种对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其次，比较史学至少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运用比较方法对历史进行研究后所获得的具体成果，这就是比较史学的实践层次；第二个层次是如何运用比较方法对历史进行研究的理论，这就是比较史学的方法论层次，亦即史学理论层次。就第二个层次说，当今国际史坛上对比较史学的对象、内容、范围等众说纷纭。有人说，比较史学是各个文明体系之间的比较。有人说，比较史学是对不属于同一地区的两个或几个社会的某些进程和制度进行比较。有人说，历史比较研究的范围，不取决于比较研究的范畴，而是利用可以令人接受的，而且大得足以容纳从事比较分析的地位与结构。有人说，比较史学指的是对各种历史现象进行时间系列上的前后阶段的纵向比较（又称垂直比较），或空间系列上的同一阶段的横向比较（又称水平比较）的一套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其实，从广义上说，比较史学应是指对历史上的事物或概念，包括事件、人物、思潮和学派等等，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比较，判明其异同，分析其缘由，从而寻求其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①。正因为如此，历史的比较研究，可以扩大史学工作者的视野，进行宏观的历史研究，并有利于铲除一己之见，甚至国家的、民族的偏见，经过比较，可以澄清一些史实，检验一些用非比较法研究出来的历史结论，更清楚地了解有可比性的历史现象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更有效地认识历史运动的规律；还可以辨明国际史坛上的一些史学概念，促进历史学本身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比较史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是不无原因的。

① 参见范达人：《略论历史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就中国史学的现状看，大力开展比较史学的研究，更是发展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优良的传统，历史编修的历代赓续，是举世无双的特色，其中，编修的原则、旨趣和方法，辑佚的方法，考据和辨伪的方法，运用史笔的方法等，后先继承，转辗发扬，蔚为大观。但是，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和文化思想的相对稳定，中国没有出现象欧洲从四世纪后约十个世纪中神学占绝对统治地位，而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又有文艺复兴那样的大起大落局面，因而在相对平稳中发展的中国史学，自唐宋以降渐趋停滞，再也没有出现《史记》、《资治通鉴》那样的史学异峰，即使被誉为史学双璧的《史通》和《文史通义》，也主要是阐述编修史书的理论和方法，或者说，它们是两部史书编纂学概论与史书编纂史的混合体。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总结道：“试一翻四库之书，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者，非史学书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学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有闻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述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端，复生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梁启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史学的批评，虽然也涉及了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但终究有些偏颇，更没有触到传统史学停滞的根本原因，即封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原因。不过，他的“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呼吁，却是极有见地的。这代表着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史学要求突破樊笼，另辟新境，用资产阶级史学观点改造中国传统史学的心声。事实上，中国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包括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夏曾佑等名家，在史学理论上，在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学术思想史

的研究与编修上，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是，囿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偏见以及残存的封建主义思想偏见，他们的史学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他们的史学研究方法也是有缺陷的。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的史学找到了崭新的指导思想，也找到了崭新的研究方法——唯物辩证法，因而中国史坛出现了新的生机。然而，无庸讳言，当今的中国史学还面临着新的困境，被称之为“史学危机”。对于是否存在“史学危机”的问题，史学界是有不同看法的。但不管如何，在提高史学的现实价值，让史学走出书斋，成为广大干部和工农兵的思想和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等方面，我国史学的现状确实尚难令人满意。因此，史学界有人在高呼“史学革新”。这与七十多年前梁启超倡导的“史界革命”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历史在一个新的起点上的继续，是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史学革新”，包括史学思想的革新和史学方法的革新两个方面。前者要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史学研究的实践结合起来，扬弃和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的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建立起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具有自己的特色的史学理论，从而促进中国史学达到提高思辨能力和现实价值的双重目的。与此同时，革除陈旧的、落后的史学方法，把包括历史比较法在内的众多的科学方法引入或复归到史学领域中来，对于我国的“史学革新”也是极其重要的。

第二节 历史比较的可行性

历史能不能进行比较？这个似乎已不成问题，因为比较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在史坛中受到人们的重视，比较史学的论著已陆续问世。其实，这个问题在部分史学家心目中，尚未彻底

了解。因此，还有必要讨论历史比较的可行性。

美国学者彼得写道：“实际上，所有的历史陈述都是内涵的比较。”^①事实确是如此。我们说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这无疑是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后作出的判断。又如，我们说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规模之大，人数之多，世所罕见。这当然也是比较后得出的结论。俄国历史上，称得上农民战争的仅四次，即1606年鲍洛特尼柯夫领导的农民战争，1667年拉辛领导的农民战争，1707年布拉文领导的农民战争，1773年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战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普加乔夫起义，参加者也仅五万人。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参加者总计不过十几万人。英国瓦特·泰勒农民起义和捷克的胡司战争，才三四万人。而中国从秦末陈涉、吴广的起义到清朝的太平天国革命，每次的人数，动辄数万、数十万，乃至百万以上。秦末，仅陈涉所遣周章一军，即有兵数十万；西汉末，赤眉入长安，号称百万；北宋末，方腊起义时人数也有数十万；明末李自成起义，拥有步兵四十万，骑兵六十万，败退武昌时尚有五十万人^②。

但是，我们所说的比较史学，不仅仅是潜在的比较、内涵的比较，而是要自觉地运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也不是偶而使用一下比较对照的方法，而是要系统地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这样的历史比较是具有客观可行性的。

第一、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所谓统一性，主要是指社会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性。诚然，人们对这种规律性有不同的见解，但至少以下几点为多数学者所公认：

① 彼得·科尔钦：《美国的比较史学》，载《美国历史评论》1982年第12月号，第65页。

② 参看《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168～17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